

(政策介紹之四)

NO 32

發展工業的勞動政策

與稅收政策

中共瀋陽特別市工委宣傳部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8719B

發展工業的勞動政策

與稅收政策

海
圖
書
館

陳伯達

(一)

各解放區製造工具的工業和製造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業之增加與供不應求，鼓舞了農民解放後中國新工業迅速發展的無限前途，而工業生產力的偉大標誌，更特別表現在工人對於生產的新的積極性。

在解放了的地方之一方面，是工人的勞動態度發生了從所未有的變化。工人們的口號，叫做『建立新的勞動態度』。建立新的勞動態度，這是解放區工人階級新的運動，是中國工人階級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下推動生產力前進的最主要的動力。有一個城市的鐵路工人代表會，已把建立新的勞動態度列為工會的工作綱領之一。根據一些公營工廠的資料，工人們在日寇和國民黨統治時期，採取『磨洋工』的態度，去對付日寇和國民黨的壓迫，有時一次大小便，也可以拖半個鐘頭或一個鐘頭，吃飯慢吞吞；但現在工人們說：可不能那末『磨洋工』了，現在是給人民自己幹活了。過去上工的笛聲變了之後，工人們還要這樣那樣拖點上工的時間，現在一聽到笛聲，就趕着上工了。過去爲了生活而

215266

偷盜材料，或在工作中缺乏責任心而浪費材料，乃是通常的現象，現在工人們對這樣情況，已有根本的改變，如有個別偷盜的，工人們就自動去追回來。所有這些，乃是目前解放區工業生產力發展最積極的因素。一個剛解放不久的城市，那裏鐵路工人修路的情況，可說是提高生產效率的一種典型。原來一根鐵軌要八個人抬，隨後就減為六個人，再後又減為四個人了。過去揀來板是一個人每次揀兩塊，現在有的竟揀到二十二塊，平均是揀八塊。過去拾枕木，平均兩個人一根，現在平均一個人一根，最高紀錄是一個人三根。過去修路，兩百人一天修六百米，現在平均一天修一千五百米，最高達到三千零五十米，超過過去歷史上的一切紀錄。鐵路附設的鐵工廠，同樣是這種情況：過去某種鐵路器材，一天一班十二三人出五六十塊，現在最高可達到一百五十塊，平均可保持一百三四十塊；螺絲過去一個架出四五十條，現在可出七八十條。有一個紗廠，過去工作十二小時，生產一磅紗，現在工作八小時，也同樣生產一磅紗。有一個鐵工廠，現在十小時的工作，比過去十二小時的工作還強。諸如此類，不能一一列舉。這是工人們政治覺悟空前提高的表現。用一切方法鞏固並繼續提高工人們的這種政治覺悟，將是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最可靠的保障。不僅是這類公營工廠是這樣；在私人資本的企業中，勞資關係處理的正確，那裏工人們的勞動態度，也同樣起了新的變化，經常有提高生產效率的新鮮事實出現。

另一方面，自由資產階級則驚羨農民解放後市場的廣闊，他們怕的是貨出不來，不怕貨賣不出去，因而對於工業經營激起了極大的興趣和熱忱。許多鐵工業的資本家，都在計劃如何擴大自己的生產事業，只因為材料不够供給生產工具的生產而着急。一個解放不久的城市，私人棉織業即由二十多

家發展到一百多家，而過去在蔣介石匪幫統制下，却由日寇佔領時代的五十家減到二十多家。自由資產階級在解放區找到了發展工業的真正出路。

目前解放區繼土地改革而已經開始的工業高潮，以及工業生產效率在各種程度上的提高，這是工業生產力向上第一步的變化，這種工業生產力向上的變化，正如土地改革後農業生產力向上的變化一樣，說明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及其必然勝利，而封建買辦與官僚資本的經濟制度，則極端腐朽及其必然死亡。

(二)

中國共產黨的工業政策，是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共產黨經濟政策的一切方面，是以保護生產和發展生產出發。離開發展生產這一個出發點的政策，將是錯誤的政策。在土地改革中，共產黨堅定地保護工商業；在職工運動中，共產黨解除殘留在工人身上的封建性的壓迫和束縛以後，堅定地反對過份提高工資及破壞生產的『左』傾冒險主義；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政府並努力對於工業發展的貸款和貨物流通等等給了便利的條件。爲着使得工業能够不斷獲得原料而擴大生產，對於煤鐵及其他礦物的擴大採掘，也已成爲我們黨和民主政府需要重視的任務。

在消滅封建土地制度和消滅官僚資本而爲中國工業發展建立最廣大的前提，並對民族工業實行堅

定的保護政策之後，對於發展工業的政策有根本意義的，概括說來，是兩個政策：一個是勞動政策，另一個是稅收政策。

第一、是關於勞動政策。這個政策主要的問題，是工資問題與工會問題。

在工資問題上，過去某些老解放區有過這樣錯誤的情況，即脫離那裏的一般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忽視工廠的具體條件，因而提出過高的勞動條件，過份地提高工資，使得工人們過着特別優裕的生活，同時也就使得該項工廠因為生產成本太貴，生產品不容易賣出，而該項工廠要擴大生產當然也就成為不可能，有的工廠甚至因此不能以廠養廠；而在有些公營工廠（指普通工業的公營工廠）中竟至需要政府的很多財政補充，才可能使該工廠繼續開工下去。若干擁護這種辦法的同志，覺得這樣就是『保護工人利益』。這種想法或這種辦法之所以錯誤，就是因為其結果不但不能夠發展工業，並且不可免地使初生的或幼稚的工業陷於萎縮，或使工廠得到關門的結果。這是工人運動中一種自殺的政策。同時，這種勉強人爲的、無原則的、盲目的，即不合理的過份提高工資的方法，也不能夠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不能夠鼓勵他們對生產與節約的努力；並且會使得有些工人們起了一種錯誤的想法，使他們走上庸俗的經濟主義的道路，使他們覺得可以有生活的特權，而這也就會使得工人們與其他社會勞動人們，特別是與農民們之間，發生生活上的互相歧視與磨擦。所以，這樣並不就是保護工人利益，相反，這是在根本上違反着工人階級利益的。所以這種政策我們決不能採取。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反對上述的錯誤偏向之後，也可能發生出或已發生出另一種偏向，即忽視工資問題的正確處理能够大踏步地推進生產力向前發展，而不問生產效率是否增進，却一律把工資限定在最初的

低的水平線上，對於特別努力提高生產和減低成本的工人和職員，沒有適當的獎勵，對於怠工和浪費材料或貪污舞弊的工人和職員，沒有適當的處分等等。很明白：這種政策，也將損壞工人和職員們的生產積極性。還有很錯誤的，即主張技術人員與普通工人的所謂『生活平等』，而對於技術人員和職員的薪水壓得過低，這當然也會損壞技術人員的生產積極性，並同樣地會反轉而影響到損壞工人們追求進步的生產積極性。當然，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中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是中國革命領導者的階級，他們是能够接受正確的政治動員，而加緊自己的生產積極性的，很多新解放了的地方，那裏工人們——特別是公營工廠的工人們的生產積極性，首先是受到政治解放的鼓舞而提高起來的。但是，這種種積極性，如果沒有經常合理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來加以鞏固，只專靠政治的鼓舞，是不能繼續提高，甚至不能經常保持的。因此，必須有正確的經常能刺激工人職員生產積極性的工資政策。正確的工資政策，應該是根據當地當時的一般生活條件，以解放前的舊工資為基礎，加以合理的與適當的調整，並在這個基礎上，實行按件、按等、按分、按節約（減低生產成本）……等類的合理的與適當的累進工資制度，以及按勞分紅等類的累進獎勵制度。這兩種制度，須根據各種工業部門的具體情況，各個工廠的具體條件，由廠長負責，由工廠管理委員會及工資評定委員會商量，與工人代表及工人群衆商量，吸收本廠的與別廠的過去和現在的經驗，決定或採用這樣辦法，或採用那樣辦法，或對於兩樣幾樣的辦法都交錯地靈活變通採用，並由廠方與工人締結生產計劃與工資條件或獎勵辦法的具體協定，而工作的考核則都要把生產的數量與質量並重。在各工廠之間的工時與工資，應互相協議，一律達到合理的規定；但應根據各廠的具體情況，容許若干差別，不可能完全一律平等。總之，一切

以對於經常能提高生產有利作為決定的先決條件。對於技師和職員的薪水，同樣需要採用這類似的制度，在保持實際的舊薪水的基礎上，根據他們工作的新勞績，節約（減低生產成本），或新創造，而按等累進。毫無疑問，根據新舊的經驗，建立這種工資制度或獎勵制度，將極大地鼓舞工人們與職員們的生產熱忱，嚴肅職工的勞動紀律，改善工廠的勞動組織，提高生產品的數量與質量，杜絕浪費，監視偷盜與貪污舞弊，減少各種不生產的消耗，並不斷提高工人們與職員們的技能，使技術落後的趕上先進的，而先進的又求更新的進步。這是推動生產力前進極重要的制度。這是鞏固和發揮工人們與職員們新的勞動態度的物質基礎。實行這種制度，各工廠的生產效率可能增加到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一百，以至比這更高。這樣，工廠的工資支出雖然比前增加，可是生產收入的增加却比工資的增加要大得很多，以至前途是難於計量。有些同志不善於作這種發展生產的企業計算，受陳舊的八股式工作所束縛，看不見生產力發展的前途，害怕在公營工廠中建立這樣的制度，這是完全錯誤的。有的同志覺得實行這種制度會鼓勵工人們的『僱傭觀念』，這也是很錯誤的。不要忘記：我們現在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還讓自由資本主義發展，而不是已實現了共產主義社會，要消滅工人們的僱傭觀念是不可能的，在實際上這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一種反動的空想，在按件工資等類制度下，工人們因為進行更多的生產而得到更多的報酬——或者說是因為求得更多的報酬而進行更多的生產——的『僱傭觀念』，並沒有害處，而且是合理的，進步的。工人們取得很多的報酬，是由於出了更多的勞力與能力，一方面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前進；另一方面，又能以更多的，生產成本更低的，即比較廉價的工業品供給農民。這樣，也就能够被農民和一切社會的勞動分子認為合理，或也就可以更加強工人和

農民及一切社會勞動分子之間的團結。誠然，實行這種工資制度，是有困難的，因為這種制度需要精确的監督、檢查與計算。但是，這種困難，是容易結合群衆的評定來克服的。這種工資制度或獎勵制度，必須建立在可能的與群衆自願的基礎上。這種工資制度或獎勵制度，將代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利益，也代表工人羣衆的個人和全體的利益，所以，就容易激起並得經常保持工人羣衆生產與節約的競賽的自覺熱潮，並容易由群衆自己來建立一種群衆互相監察，互相檢查，互相評定的制度，使那些積極工作，善於節約，愛護公物的工人、技師和職員，獲得應有的獎勵，而使那些怠工，浪費物質，偷盜貪污的人受到應有的處罰。

這種刺激生產的工資制度與獎勵制度，在私人資本的工廠中，已有很多採用的，積了不少的經驗，在經營上獲得很多利益，今後同樣地應該鼓勵（但不得強迫）他們合理地自由採用，而公營工廠應當向他們學習已經有了的這種許多不同的合理的很有用的經驗。

關於勞動政策中的又一重要問題，即工會問題，在解放區也提出了完全新的問題。解放區的職工運動和工會工作，應該在上述工人們建立新的勞動態度的正確口號下，鼓勵工人們生產的積極性，促進公私工廠的工人與廠方（公營工廠是廠長、經理及工廠管理委員會，私營工廠是私人資本家及經理等）共同商量締結生產計劃與工資的協定。並經常集中生產的經驗教育工人，把我們的工會變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生產的學校。同時，在各工廠創辦為工人謀福利的合作社，這種合作社應當具有消費與生產的雙重性質：一方面，供給工人消費品，使工人們的工資不受或少受市場上物價波動的影響，另一方面，幫助工人解決家庭生產的困難，使工人得以安心工作。現在由於物價經常波動，使規定工

人工資發生困難，有些工廠按每月米、煤、布等實物價格來規定工資，不過這是非常繁雜的，工人也要受些損失，工人合作社如能擔負供給工人必需品的任務，在一定時期內不變動各種物價，即在一定數量上配給工人各種必需的實物，則可使工資在一定時期內不致變動，工人也不受損失。比較固定價格的實物配給制，是戰時比較最能保護工人利益的。這須要政府、工會與合作社的一致努力，才能很好的實行，工會與合作社就應用大力來辦到這一點。應該說，我們許多在工會工作中的同志，對於這些事情，是還不熟悉的。但一切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三)

第二、關於稅收政策。

我們黨的綱領是保護工商業。但工業比起商業來，工業又是最基本的。工業生產社會的財富，而商業（指正當的商業），只是盡商品流通的職能，是在一定社會中發展生產所不可缺少的一種經濟活動，故必須保護商業，使其能夠順利地盡其一定社會的合理的職能。但商業並不生產社會的財富。會在某一個座談會上，有些工業資本家提出工業與商業的稅收，應該有些區別，工業稅比商業稅更需要從輕，以便促進生產的發展。顯然，這種要求是合理的，應該成為解放區稅收政策的原則之一。這是工商業稅的第一個原則。同時，在那個座談會上，又共同同意：在工業各部門之中，對於製造生產工具及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業稅，也應該與製造奢侈品及非必需品的工業稅有區別，即製造生產工具及

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業稅比製造奢侈品及非必需品的工業稅，又需要從輕，顯然，這種意見也是合理的。這是工商業稅的第二個原則。工商業稅的第三個原則，就是用單一稅去代替國民黨暴政時代五花八門的苛捐雜稅。這些工業稅的原則，乃是從保護工業的生產出發，從保護工業發展的正確方向出發，並保障那一切製造生產工具和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業有不斷擴大再生產的可能性。把這些原則變成實際，會有不少複雜的問題，而我們過去對這類的經驗又很缺乏，但實際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也仍然是在善於學習。正常的工商業所得稅，在解放初期或目前的條件下，實行起來，當然還有些困難，各地方斟酌具體情況，是可以採取一些過渡的辦法的。例如，在上述的那個座談會上，我們同志曾經和那些工業資本家商量出工商稅一種過渡的辦法：即由政府稅收機關根據當地各種行業的廠號、資本、營業等等具體情況，擬出一定期間（比如半年或一年）的該業稅收數字，並和該業資本家商議此項數目是否適當，即由該業資本家共同擔負下來，然後在該同業內，由各廠號民主討論，自報公議，按能力公平分配負擔，先營業，後納稅，而在這個負擔的期間內，除交納這個數目外，不問該工廠的生產如何擴大，不再加稅。參加座談會的工業資本家，一致歡迎這種過渡的辦法，他們覺得這種辦法好辦，而更重要的，是這種過渡辦法還可促進各工廠擴大生產或改善生產技術的自由競爭，交納多少又是經過大家公議，同業之間彼此都很熟悉，很難自私作弊，可說是公私兩利。在還不能順利實行正常的工商業所得稅之前，各地實行類似這種對於發展生產有利無害的過渡的稅收辦法，是很有必要的，而在試行的初期，因為經驗還缺乏，同時，是對於投資和經營的新鼓勵，稅收的數目是應該以定得比較低些為適宜。

(四)

由於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我們將解放更多更大的城市，以及土地改革後工商業的發展，處理工商業的具體政策問題，已成為我們黨日當須要注意的議事日程。經常集中經驗與羣衆意見，定出方法，修正錯誤，這就能夠保證我們正確地執行毛澤東同志的理論與政策。

(新華社陝北二十一日電)

上海圖書館藏書



232150